

# 多少恨

關品方

1991年6月19日(澳洲,雪梨,櫻桃小溪)

不見姚希有兩年多了。這一陣子忙著搬家，整理桌上的舊信件和舊照片時，偶然地翻出一張多年前和一班朋友在雪梨歌劇院前的留影。站在正中間微揚著頭，笑得燦爛如盛夏的陽光的那個女孩，就是姚希。都是二十來歲的年輕人，男男女女帶著各自不盡相同的往事，先後離鄉別井老遠跑到這裡來，走在一起。那些日子裡，書念不成、身份弄不到。打發著寶貴卻不能善用的時光，只感覺到青春在嘶嘶流走。我們都是掉在時間的夾縫裡的一群，就像身前身後有兩座高牆，吶喊得聲音黯啞，蹦跳得力也盡了，總無法逃出去。

姚希算是終於逃了出去的人吧。初來時大家都淒淒惶惶，爲了一日三餐。也有不少是借了債巴巴地跑來的。家書裡面寫的都是不痛不癢的謊言；姚希說是怕他們知道實情。儘管傷心，卻於事無補。可是家裡人總不明白，還以爲女兒終於出國了，過的只有是好日子。就差點兒沒有開口要她寄錢回去。姚希和我談到這些，雖然只是淡淡的，而且嘴角還帶著微笑，可是我能夠體會她背後的落寞和酸苦。同是天涯淪落人，我和她之間唯一的不同，只是我來自一個不用我擔心身份的國度。我在這兒也有親戚。但對姚希來說，孤身來到這裡只不過是第一步。她還要從這裡設法跑到另外一個可以長久棲息的地方去。

我們有大半年光景同在一間中央車站裡的咖啡廳作侍應。姚希有很不錯的學歷。可是那又怎樣？她笑說，還好跑到這個店裡來了，雖是艱苦一點，總算避免了“誤墮風塵”。有一段時間，被生活壓迫得緊了，爲了支付那筆學費，她曾經想過到那些酒吧去侍酒。“要穿那種衣服站在櫃檯前。我想過，或許就試試吧，一咬牙不就撐過去了？總比躺下來強些。”那天她不無感慨地向我追述。我

們都知道，幹那種事情，就好像走在泥潭裡，會越陷越深，終至自暴自棄的。和這店面比較，大概做那些是週薪一千塊和我們這兒二百塊的差別吧。可是就有女孩子寧要一千，甚至更多。反正在這兒舉目無親，做的日子長了不就感覺也麻木了，算不了什麼。話是這麼說，可是姚希還不至於。

“總比在家裡的時候強些。”姚希雖然這麼說，可是她很懷念在上海的日子。誰能忍心拋棄自己童年的記憶？她住的弄堂，早上要跑到街上公用的水龍頭去刷牙梳洗。一家四口擠在一廳一房，父母睡在房間一邊，她和妹妹睡在另一頭，中間只隨便掛上一塊半舊的布簾隔開來，十多年來都如此。整個上海大部份市民就是這樣擠迫在一處，住的是五十年不變的老房子。她家裡的大雜院，四周五、六間屋子，每間屋子都住上五、六家人家，彼此呼吸著對方呼吸過的空氣，一天到晚吵吵鬧鬧，都是環境太不像話的結果。樓梯兩旁永遠胡亂地堆放著雜物。煤球爐子東一隻西一隻，備飯時各家人家煮的是什麼菜，不用看都彼此曉得。大雜院的地面上永遠是濕漉漉的，有洗不完的衣服。她母親在弄堂對過一個角落找到剛容得下一部腳踏車的小塊地方，在那裡十年如一日地替街坊們縫補衣服賺點錢幫襯著家用。這麼一點微末的個體經濟，在文革時還是被粗暴地“禁止營業”，因為據說這樣做會導致資本主義復辟的。母親向姚希“細說從頭”時，永遠是那樣平靜，不像是說的自己的故事。人家的孩子在那個火紅的年代出生的，不叫“向陽”，就叫“衛東”、“永紅”。可是她母親給她取了單名一個“希”字。希望在人間。不過，那時候時髦用單字取名，姚希當然不能免俗。她母親的小指頭短了一截，也是那時候被革命小將們搶奪那部母親視之如命的腳踏衣車時不小心弄斷了的。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一點點傷殘就作為時代的烙印，早晚提醒著人們“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我和姚希多少個晚上在燈下促膝而談，她總是帶著深情娓娓地細談她的童年，她的成長和她的希望。她還說過，臨行前她母親含淚叮嚀，叫她“你走了千萬不要想著回來。”

畢業後她當過兩年涉外接待。她在上海工作的單位搞的是輕工業產品的對外貿易促銷。外國人來華找交易夥伴、推銷產品，或者出口展銷一類的貿易活動，對姚希來說，一兩年下來就駕輕就熟了，而且英語也有了很大的進步。她交了一個外國老頭兒，叫舒密特。他對她說：“我很老的了。希望你不要嫌我老

。"她只是微笑著，不置可否，讓他把她的手深情地握著。姚希回憶說，當年她身邊的那些小夥子也沒有誰讓她特別看得上眼。這年頭女孩子是不是都學乖了，不會那麼快就自訂終身，跟上了誰就非要跟定一生一世。要不彷彿一場戲還沒有演到戲肉就要謝幕的樣子。我和姚希在這方面立場一致。這世界多美好，而我們總是那麼愛花錢、愛美、愛派頭。我們是既安份又不安份。

只怪澳洲的"出口"教育。到澳洲這個想法在姚希的腦海裡徘徊了好一陣子。申請來澳洲唸英文，"把外語更好地掌握，為四化做更大的貢獻。"她這樣對領導說。六四前這類事情好辦。來了之後

又隨大流申請了延長四年居留。在這裡有五光十色的櫥窗，一望無際的白雲藍天。下班了不用趕什麼政治學習，也不用看領導的臉色做事。工作、交朋友、逛街、看書都可以"率性而為"，自食其力，海闊天空。窮一點沒什麼，雖然姚希總是希望著生活過得寬裕一點 - 那只是一個卑微的希望，但無愧於心。

舒密特一直在做他的中德貿易。他忘懷不了這個溫婉而爽朗的中國女孩子，特地繞道來澳洲找姚希。還記得那天她下班後要趕去看他，整個下午顯得扭捏不安。他有相當的積蓄，卻沒有多少青春剩下來享受了。他年前離了婚。他的子女都比姚希大。他那天晚上和姚希談了很久。他給她看他的護照。原來他的真實年齡比他的外表還要老。是六十開外的老頭了 - 而他竟然向她求婚。他說可以帶她到漢堡，會好好地照顧她。這些細微末節，姚希在舒密特走後的一段日子裡點滴地告訴了我。我咬著牙下定決心，只做一個忠實的聽眾，不能給她任何具體的意見。

漸漸地我知道她是差不多決定了的。過苛的生活經歷，漂泊不定的情緒無可憑寄，使她和與她有相同背景的中國女孩子們厭倦透了這種不知結果的等待。誰知道幾年後有沒有真個取得身份永久居留的把握？

怎能夠這樣虛耗著一生中最可寶貴的青春？後來，姚希隱約地告訴了我她作出決定的原因。她認為舒密特是一個君子，可能對她真有點感情，而不是只戀慕她年輕的肉體。那幾個和他共處的晚上

她顯然是放棄了一切防守的。但是他卻止于最後一步。他沒有要她。反正這幾年的青春若總要浪費掉的話，那就不讓它虛擲，總要換點什麼回來。說不定多少年後會重獲自由吧。雖然到時她要先變成寡婦。或者狠心一點

過橋抽板一走了之。是的，等不及的話，她可以離開他。那天晚上姚希坐在梳

粧檯前喃喃地和我說著這些，那冷靜的神情和慘然的笑容，在鏡子裡反映在她蒼白的臉龐上，我在一旁看著，只感到陌生恐怖。她用扭濕了的毛巾狠狠地在臉上抹著，像是要抹掉自己不願看見的怨恨的神情。我們都感到非常惆悵。

她在上海有過一個要好的男朋友。來澳洲之後又認識了曲鴻山。上英語課時在班上認識的。那段日子雖然平淡，但姚希說很可回憶。歌劇院前留影的那張照片裡，緊挨在姚希身旁的那個頹長的年輕人，我認得就是他。可是要姚希和他一塊熬過這些去國的年月，共同面對不確實的未來；或者甚至一塊回國，結婚、生兒育女——繞一個圈子還是跑回原來的地方去？她才不會幹這種傻事。她說要是可以重新再來，她還是會出國的。多少個晚上，我都睡下了，姚希還呆坐在書桌前，雙手交疊支著下頷，面對擺在眼前的日記本子，黯淡的目光中泫然欲涕。她有寫日記的習慣，可是那段快要離開澳洲遠嫁德國的日子裡，她簡直是舉筆艱難。

她走後沒幾天，曲鴻山找到我的店裡來，臉色刷白，連聲問姚希的下落。我直到那時候才知道姚希自始至終隱瞞著他。記得數月前，有一天姚希返家很晚，神色怪異，靦腆中帶著愉快和滿足。那神情我約略猜到三分。果然她還是守不住秘密似地問我沒有做預防怎麼辦。我瞅著她笑說：“那你就跳呀！不停地跳，而且要單足跳！踢踢腿不就都出來了？”這傻女孩果然紅著臉蹦蹦跳跳鬧了一個晚上。直到我們都笑痛了肚子，互相擁抱著，扭在床上彎不起腰來。她這以後的一個星期左右，上班時空閒下來就做她倉促地自己發明的腿部體操，怕懷了孕。她走後的一段日子，我和其他幾個女孩子、女工頭們和女老闆都還會偶爾提起姚希的自創體操。看著她們模仿著姚希踢腿蹲身，我總忍不住笑得合不攏嘴，同時不免深情地懷念起姚希來。

曲鴻山知道姚希不辭而別，神情黯淡下來，良久不語，呆在當地。她走了，不過我知道她身子給了他，作為永久的記憶。這才叫人柔腸寸斷。他喉間堵塞著，咕囔地亂說話追問著我，問的是什麼問題我都聽不清楚。大概是有沒有信件給

他，有沒有留話，與及在德國的聯絡地址之類的問題。我匆忙地扭過身去，不敢正視他無告的眼神；他一直從我頭頂上看過去，像瞪視著前面的一片漆黑，荒涼而死寂，像是盲人的雙眼。我知道他每天在一隻遊覽船的餐廳裡做廚房工作，晚上還要到報館的排字房排字和校對。聽說空閒時還挺熱心地為同學們奔走，以六四為由申請居留權，不辭勞苦。他將來應該有出息的。在那遙遠的將來。誰知道呢？前路是不是太坎坷、太遙遠了點？姚希遠走，就是因為她淒然搖頭，要擺脫播弄著她的這個不知道，而跑了去依附漂來的稻草。

是的，姚希她走了，只留下一個蒼涼的手勢。

<完>